

清史编委会 编

主编 罗明
潘振平

清史人物传稿

·下编·
第九卷



K820.49

L952

20(8)

K820.49
40
2-9

清史编委会 编

清代人物传稿

·下编· 第九卷

主编 罗 明 潘振平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沈阳

(辽)新登字1号

清代人物传稿

·下编·第九卷

Qingdai Renwu Zhuan'gao

罗明 潘振平 主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)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302.0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3 $\frac{1}{8}$ 插页: 4

印数: 1-440

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高 虹 责任校对: 吴广君
封面设计: 赵多良 版式设计: 赵耀今

ISBN 7-205-02507-9/K·289
定价: 8.60元

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，在撰写过程中，得到国家资助。

《清代人物传稿》下编

编委会成员

戴 逸 林增平 菡书义

李文海 林言椒

目 录

道光帝	潘振平	(1)
季芝昌	卢仲维	(16)
杜受田	杨益茂	(21)
周祖培	余明侠	(27)
僧格林沁	张瑞萍	(32)
载 垣	岳 彬	(41)
舒兴阿	余明侠	(45)
张 蒂	岳 彬	(50)
潘 锋	卢仲维	(54)
劳崇光	杨益茂	(60)
张亮基	刘岳斌	(68)
英 翰	刘岳斌	(73)
刘 典	刘岳斌	(77)
李兴锐	刘岳斌	(81)
杨岳斌	邹宏斌	(85)
卞宝第	罗 明 吴玉清	(92)
李鸿章	苑书义	(95)
潘祖荫	张 浩	(109)
长 庚	闻 晴	(113)
唐 焰	罗 明 吴玉清	(117)

王文韶	岳 彬	(121)
周 馥	邹小站	(128)
胡燏棻	岳 彬	(133)
林绍年	吴玉清 邹晓辛	(137)
袁大化	郭汉民	(143)
奕 劼	杜继东	(149)
载 振	许 放	(157)
瞿鸿机	周育民	(162)
鹿传霖	郭汉民	(168)
孙宝琦	邹小站 曹 艺	(172)
汪大燮	邹小站	(178)
于式枚	郭汉民	(185)
王之春	郑 炎	(189)
载 泽	迟云飞	(192)
世 续	郑 炎	(198)
载 洋	郑 炎	(202)
升 允	张 钦	(207)
张 勋	郭汉民 夏 驰	(213)
洪秀全	苑书义	(222)
石达开	苑书义	(235)
吴如孝	董守义	(245)
卢贤拔	董守义	(249)
曾钊扬	高 虹	(251)
何震川	高 虹	(252)
马占鳌	杨洪波	(254)
马文禄	杨洪波	(259)

白彦虎	杨东梁	(263)
王德成	闻 晴	(269)
倪映典	刘启峰	(271)
万福华	谢照明	(276)
龚宝铨	赵立彬	(279)
李燮和	赵立彬	(283)
胡 瑛	杨鹏程	(289)
蔡元培	迟云飞	(296)
梁 发	杨益茂	(304)
何绍基	罗 明	吴玉清 (310)
汪士鋐	梁锦秀	酒烈芳 (313)
陈 澄	梁锦秀	酒烈芳 (317)
冯桂芬	黄名长	(323)
王 韬	刘岳斌	(329)
王先谦	黄 林	(336)
曾 铸	郑 嵩	(343)
梁启超	郭汉民	(347)
高 旭	余幼钦	(360)
黄 侃	周 武	(367)
裨治文	岳 彬	(371)
戈 登	叶凤美	(376)
颠 地	刘岳斌	(381)
德璀琳	叶凤美	(384)
李佳白	叶凤美	(389)
福开森	叶凤美	(394)
樊国梁	刘岳斌	(401)

-
- 朱尔典 叶凤美 (405)
哈 同 叶凤美 (410)
后 记 (416)

道 光 帝

潘振平

道光帝旻宁，爱新觉罗氏，生于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（1782年9月16日）。嘉庆帝颙琰的次子，清朝入关后第六代皇帝。

旻宁原名绵宁，爱新觉罗家族传至他这一代，为“绵”字辈。因“绵”字，不易回避，故乾隆帝曾谕“将来继体承绪者，当以绵作旻”^①。其生母喜塔腊氏，是嘉庆帝元配妻子，后称孝淑皇后。旻宁6岁授读，接受严格而系统的传统教育。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初次随扈行围威逊格尔，引弓获鹿，乾隆帝大喜，赋诗有“老我策骢尚武服，幼孙中鹿赐花翎”之句。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大婚，娶户部尚书布达赉之女钮祜禄氏为妻。此后，在嘉庆帝所赐园居“养正书屋”中居住20余年，“日与诗书相砥砺”^②，写成《养正书屋诗文》40卷。四年四月初十日（1799年5月14日）立为皇储。长期的深宫生活对旻宁的性格形成有一定影响，他后来追述说：“朕自幼承受教训鞠育之恩，择师诲导，涵养有年，虽不敢自信恢宏，亦不知粗厉偏狭。事愈大，心愈小；情愈急，气愈和，此朕自励之常规也。”^③

十八年（1813年）九月，久居京郊的天理教坎卦教主林清策动起事，十五日在信教的内廷太监接应下攻入皇城。时旻宁在上书房读书，闻讯即组织防堵，并亲手以鸟枪击中两个教徒。事定，封智亲王。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七月，随其父到热河避暑山庄，嘉

庆帝突然发病，二十五日死于烟波致爽殿。旻宁“恭视小殓毕，扈从诸臣遵奉硃笔遗旨，请上即正尊位”^④。八月二十七日（10月3日）正式即位于太和殿，颁诏天下，改明年为道光元年，时年43岁。

在经历了“康乾盛世”之后，清王朝此时已呈现出衰败之象。盛年继位的道光帝，颇欲振刷朝纲。自热河返京后，他召见吏部尚书英和，询以治国大政。敢作敢为的英和提出要清查陋规，示以限制。九月十一日（10月17日）道光帝谕令各省督抚藩司逐一清查所属陋规，对这一官场腐败的毒瘤开刀。他认为：“此次议存之款，因其相沿已久，名为例禁，其实无人不取，无地不然。与其私以取之，何如明以与之，且示以限制，使此后不敢加增。”^⑤这个方案由于伤害了各地官吏的实际利益，所以受到一致的激烈反对，或云“舆情不协”，或称“尤失政体”。道光帝除了屈服，无路可走。十二月十三日（1821年1月16日）谕令“停止查办”，说自己“于天下吏治民生情形未悉”，“此事不但无益于民生，抑且有伤于国体”，英和则因“冒昧建言”而退出军机处^⑥。

面对逐渐激化的社会矛盾和逐渐暴露的社会问题，道光帝在施政方面提出“实心实力”办事的主张，企图以“实政”来清除积弊，维持王朝的长治久安。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的一则上谕称：“朕承皇考付托之重，一切事务，必以实心实力办理。现如今上下相蒙，几成痼习，在在弊窦丛生，遇事若不认真究办，水落石出，仍蹈因循疲玩之习，朕甚惧焉。”^⑦“从实”、“实行”、“实力”、“实心”之类字眼，屡屡见于他在臣工奏折上的批语中。在十七年（1837年）六月的上谕中，他总结说：“朕御极以来，用人行政总求一实字。”^⑧。

不过，道光帝的“实政”施行起来并不顺利。除了官员阳奉

阴违、巧言搪塞外，他自己也常常事与愿违。道光帝心目中的理想是“康乾盛世”，恪守祖制是他施政的基础，声称“朕办理庶务，咸遵旧制”。他依据深藏宫中的祖先历朝实录处理政务，谕旨中常常引经据典，奉若神明。他所提倡的“实政”，只能在“祖制”允许的范围内。所以，恪守祖制的道光帝常常会出来反对提倡实政的道光帝。四年（1824年）末，江苏堰圩要工溃决，漕运受阻，漕粮北运只得靠海运。在经办人江宁布政使贺长龄以及陶澍等的组织下，海运船队于六年二月离开上海，往返两次将160余石漕粮顺利运抵天津。在统治集团中许多人心存疑虑、极力推诿观望时，道光帝支持试办海运，解决了当时一大难题。但他内心里，仍认为“海运只可暂行，河漕必计久远”，坚持要“渐复旧规”。海运成功后，他只派一些官员在沿海地区海神庙烧香磕头，挂上御书匾额，从未想过总结经验，完善措施。终道光一朝，每年在河工上投下大批银两，但漕运仍时时发生阻碍。道光帝执政30年，所遇到的问题成堆，积重难返，他虽然痛下决心施行“实政”，收效却不明显。他虽然成天忙碌，却总是顾此失彼。他虽然觉察祖宗留下的“家业”已经破旧，却总想依据“祖制”修修补补，从不考虑另觅新法。所以，他只得在各种现实问题的矛盾中苦苦周旋，眼睁睁地看着清王朝衰落下去。

道光帝登基刚10天，就传来了西北边陲发生动乱的消息。事情是由当地大和卓博罗尼都的后裔张格尔纠集闹事挑起的。张格尔的玛赫杜米家族曾长期统治天山南麓广大地区，在政治上、宗教上都有广泛的影响。乾隆年间博罗尼都曾参预反清叛乱，事败被杀。其后裔逃至浩罕，张格尔即博氏次子。八月间，张格尔率300余人骚扰边卡，清方领队大臣色普征额带领清军很快将其击溃。道光帝接到奏报，最初的反应是“勿妄杀戮，以安众心而靖

边圉”^⑩。他听到参赞大臣斌静将其一概处死的消息后，心里就起了疑惑，即令伊犁将军庆祥前往调查。不久，斌静等人种种腐败不法的行为被揭露出来，道光帝即将其治罪。但是，已经继承了宗教首领身分的张格尔没有停止活动，他“以诵经祈福传食部落”^⑪，以图再起。他脱离了浩罕的控制，不断组织布鲁特（柯勒克孜人）前来骚扰。五年九月，清军 200 骑兵出塞追捕张格尔，不遇，便屠杀了布鲁特一个游牧营地的妇孺百余人。这个营地的首领随即领人将清军围困于一个山谷，全部杀死。这次血腥事件给了张格尔一个极好的借口，由此势力迅速扩充。六年六月，张格尔率 500 多人窜至喀什噶尔附近的祖先陵墓（称“玛杂”）祭扫，被清军包围。张格尔设法突围而出，“各回响应，旬日万计”^⑫，清军只能退守喀什噶尔。两个多月后，张格尔在浩罕军队的协助下，攻陷喀什噶尔，庆祥自缢身死。随后，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三城亦相继失陷。

南疆军事形势急剧逆转的状况，道光帝七月中旬才知道。他即以钦差大臣关防授陕甘总督杨遇春，令率陕、甘兵 5 000 人前往进剿。下旬，因所调各路兵马达 20 000 多名，遂授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，令其“恩威并用，首先效顺者，许以自新；负嵎不悛者，尽行剿灭”^⑬。此后两个月内，道光帝对西北用兵下达了一系列上谕。他最关心的是要擒获张格尔，下令献缚者封王爵，赏 10 万金。他特别向往制定一个出奇制胜的计策，为此还找出宫中所藏乾隆朝西北用兵的舆图披阅。鉴于嘉庆年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军费用过大的教训，他强调这次必须定则例，绘图说，以备稽核。张格尔裂土称王后，横征暴敛，很快激起当地居民不满。他的军队人数不少，但缺乏训练和组织。清军发动攻势后，张格尔节节败退。七年二月，清军全线出击，长驱直入，三月初收复喀

什噶尔，并次第收复英吉沙尔、叶尔羌、和阗三城，但张格尔逃逸。道光帝为此愤懑不已：“览奏实深痛恨，殊失朕望”，“试思兴师动众，若不速得首逆，作何了局？”^⑩直到八年正月二十二日（1828年3月7日），长龄等才“红旗报捷，生擒首逆张格尔”。五月十二日（6月23日），道光帝登上午门，主持“受俘”仪式，两天后，张格尔被“寸磔枭示”。

西北用兵实际上已暴露出清廷对边疆的统治及清军作战、应变能力的诸多弊病，但道光帝似乎不愿意对这些问题多作思考，只把善后事宜交给当地官员筹划处理了事。为了纪念西北用兵的成功，他下令勒碑太学及喀尔铁盖山（俘张格尔处），又亲自为有功将士图形紫光阁，序称：“朕志先定，默叩天祖，勉竭寸忱，非敢邀功拓土，只以失守旧疆是惧。”^⑪

西北边疆烽烟甫定，如何对付鸦片走私这一更棘手的问题已摆在了道光帝面前。早在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，清廷已完全禁止鸦片输入，但鸦片走私估计每年在4 000箱以上。道光帝即位之初，重申了嘉庆时的禁令，严查海口，广州方面的鸦片贸易一度吃紧，烟贩设趸船于零丁洋。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吏、兵二部制定了《失察鸦片条例》，上谕称：“鸦片烟一项，流毒甚炽，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。”在这以后，由于河工吃紧，漕运危急，加上西北用兵，道光帝几乎没有时间来过问这个问题，鸦片年走私数量很快突破了10 000箱。随着鸦片走私数量剧增，白银外流问题引起了统治集团的注意。早在道光二年，御史黄中模就提出过鸦片“耗财伤生，莫此为甚”。道光九年正月御史章汎报告说，鸦片每年易银数百万两，吸食者遍布十数省。道光帝即令广东方面封疆大吏李鸿宾、卢坤等妥议章程，结果订立了《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》及《查禁纹银偷漏及鸦片分銷章程》，将打击目标集

中到走私烟贩以及包庇他们的书役兵丁身上。十年六月，御史邵正笏奏称内地多有种植鸦片事，引起道光帝注意，他下令各省妥议具奏，结果形成一场全国性的鸦片种植普查活动。十一年复奏的 15 省中，除浙江、广东、云南、四川 4 省明确承认部分地区有种植之事，其余各省有的一口否认，有的含糊其词。到了这年年底申报时，陕西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、直隶、热河、河南、山西均报没有种植，但有兴贩；其中 6 省说官署吏役无吸食，一省说虽有吸食但已惩办，一省说难保必无。上报朝廷的情况丝毫没有反映出当时鸦片年走私数量 16 000 箱的事实。在查禁鸦片问题上，道光帝陷入了一个无形的泥潭，他需要整个官僚机器运转起来，但这部机器实际上已经失灵。

到了十五年（1835 年）年底，道光帝终于对各地每年报告平安无事的奏折感到厌倦，下令停止年终的奏报。他的这一举动，使一些官员认为朝廷的态度有变化，于是公开提出弛禁主张。十六年四月，太常寺卿许乃济上折主张恢复嘉庆以前的鸦片进口征税制度，以货易货，控制白银外流；各地只要不妨碍农业，罂粟亦可栽种，以抵制从外洋输入的鸦片。尽管道光帝后来说自己当时感到这个建议“不得政体”，但事实上他当时并没有申饬许乃济，而是请广东官员讨论。广东方面很快复奏，同意许折的说法，并制定出实施章程。这时，内阁学士朱嶟、给事中许球强烈反对弛禁的折子也已递上，道光帝再次让广东官员讨论。广东的复奏对朱、许的意见不以为然，说当务之急“总以杜绝纹银出洋为第一要义”，“不在此时争执虚名，屡劳宸廑也”。道光帝对这种看法表示赞赏，以为这样就能解决银漏之事，殊不知自欺欺人的结果，是鸦片年走私量突破了 30 000 箱。

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，各地查获鸦片之事时有所闻，而

白银外漏也未见遏止。按当时一些御史的估计，鸦片进口每年要耗银七八千万两（按近年来学者的研究，当为 1 000 多万两）之多。他们不断在奏折中报告这些数字，使道光帝感到“纹银出洋，于国计民生，大有关系”。鸦片走私已经不是一个道德风气问题，而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经济问题了。十八年闰四月，鸿胪寺卿黄爵滋上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》，提出重治吸食者，甚至将吸食者处死。这是百余年来最严厉的禁烟主张。道光帝让各地官员对这份奏折表示看法，到九月份，29 名封疆大吏陆续复奏，其中 8 人完全同意黄爵滋的主张，另外 21 人不同意采取极端措施，而提出严查海口、重治烟贩等各种意见，但无一人说要弛禁。道光帝命令大学士、军机大臣会议各地的回奏和章程；初八，将吸鸦片的庄亲王奕奕和辅国公溥喜削去爵位，同时，令各地更严厉地查拿烟贩；初九，下令京师严查鸦片；十一日，以“冒昧渎陈”的罪名处分了主张弛禁的许乃济。在他的主持下，持续数年的禁烟活动开始进入高潮。九月十九日，清廷接到了署直隶总督琦善的奏报，称查获广东运抵天津的烟土 131000 余两。这个消息使道光帝极感震动。二十二日的上谕称：“鸦片烟流毒最甚，现在天津地方于一船之内，搜获如许之多，此外浸灌海口者，更不可以数计”^⑩。他已经感到，查鸦片光靠旧时照章办事那一套看来不够了，非得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不可。二十三日，他下令要林则徐立即晋京陛见。十一月初十，林则徐到达北京，道光帝在八天中连续召见八次。十五日，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，“驰驿前往广东，查办海口事件。所有该省水师，兼归节制”。他要林则徐“竭力查办，以清弊源”，将“种种弊寨”“净绝根株”。

道光十九年一月林则徐到达广东后，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，迫使英人交出鸦片 20 280 余箱。四月二十二日（1839

年6月3日),在林则徐主持下,将这批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。道光帝称赞林则徐“此次查办粤洋烟土甚属认真”,并亲笔将部议“加一级”的奖励改为“加二级”。六月十八日,道光帝在林则徐等报告收缴鸦片已全部销毁的奏折后批道:“可称大快人心一事”。先是,他已于五月五日批准了大学士等会议的《严禁鸦片章程》,下令“纂入则例,永远遵行”。这个章程共有39条,条款之细,惩办之严,都是空前的。

在这期间,英国侵略者不断对中国实行武装挑衅。五月,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行凶,打死村民林维喜,打伤妇女儿童多人。林则徐多次要求英方交出凶犯,英方拒不交出;同时,鸦片走私更加猖獗。六月二十日英国兵船进逼九龙,发炮攻击清军,发生冲突。道光帝并未感到战争迫在眉睫,他告诉林则徐等人:“朕不虑卿等孟浪,但诫卿等不可畏葸,先威后德,控制之良法也。”九月底十月初在穿鼻、官涌中英冲突升级,道光帝听到的奏报是大获全胜,所以下令断绝对英贸易,驱逐所有英船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,英国内阁在1839年10月1日(道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)已经做出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定。他即将面临的敌人是一支武装精良、训练有素的远征军,与历朝历代入寇骚扰的“边夷”完全不同。

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二日(1840年7月20日),英军入侵定海的消息传来,道光帝轻蔑地说:“此等丑类,不过小试其技,阻挠禁令,仍欲借势售私,他何能为?”他马上调兵遣将,相信“不难即时扑灭”。他的这种态度,在七月十六日接到直隶总督琦善称英人在天津“投递字据,声称诉屈”的报告后开始变化。打仗要花费大笔银子,又要冒一定的风险,既然英人北上“诉冤”,道光帝主观以为,凭借天朝上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,就能平息事端。

七月二十日，琦善将英国公文《巴麦尊照会》送到北京，道光帝在详加批阅后，只对英人要求“昭雪伸冤”留下深刻印象，至于赔款、割地等要求，则被看作“乞恩”，不必为此多费脑筋。他认定，英人是由于通商不成和烟土被没收而起衅闹事的，“正可乘其贪恋之私，藉用羁縻之法”。琦善在报告与英人接晤的折子中，将英人要求归纳为“雪冤乞恩两大端”，更使道光帝相信自己看透了英国人的心思。他给在广东忠心耿耿地执行他的严禁鸦片政策的林则徐安上“受人欺蒙，措置失当”的罪名，让琦善劝英国人先退回广东，准备推出林则徐治罪，以安抚“夷人”。他所感到棘手的问题，似乎只有烟价索赔一项。夷船平静地起碇南下，使道光帝深感“羁縻”成功。八月二十二日，他任命在天津谈判中显露“外交”才能的琦善为钦差大臣，前往广东查办事件，又令各海岸不许对英舰开火。他相信“抚局”之成已指日可待，要沿海各省赶紧裁撤兵勇，以节糜费。

十一月，琦善赶抵广州，马上发现事情不妙。对英人提出的议和条件十四项，他根本不敢上报，只是含糊其词地说英人语气傲慢，态度恶劣。这时，道光帝也因英夷并不仅不交还定海，还开炮轰击广东师船，开始调兵备战。十二月十四日接到英国人索要香港的奏折后，他决定“痛加征剿，以张国势”，但这时广东的局势已一塌糊涂了。英军占领了沙角、大角炮台，惊慌失措的琦善在炮口之下答应赔款并割让香港。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，道光帝通谕中外对英作战。八日，授奕山为靖逆将军，户部尚书隆文、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，赴粤征剿。十九日，令积极主战的两江总督裕谦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前线，替换在收复定海问题上“游疑畏葸”的伊里布。二月初六，就在英军攻占横档、虎门等炮台的同一天，怡良揭发琦善私割香港的奏报到京，道光帝下令将